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保管箱出租业务广告牌



外滩23号远东第一金库

← (上接11版)

午同静淑携徐甥传桐同至金城保管库，将永阳王、敬太妃志、四欧碑、《梅花谱》、玉印两匣、宋哥窑罐碟各一件计十事安置，带归仲圭、叔明二卷、五代钟馗一轴”；翌日，补记金城保管库内藏品信息：“保管库中置品（存十五件）：梁永阳王、敬太妃双志匣；宋拓四欧碑册一匣；《梅花喜神谱》一匣；玉印（嵌玉匣）一匣；玉押紫檀匣一匣；哥窑坛一只（布匣）；红哥窑盆一只（布匣）；周玉鉢一方一匣；宋玉押一方一匣；二十八将军印一匣；白玉蟾字一卷；吴小仙《铁笛图》一卷；恽公《夏山图》一卷，又《衡岳图》一卷，又题吉金拓本一卷”，等等。

随着金城银行的艺术品保管业务在藏界形成口碑效应，令一些海上藏家近悦远来，仅从吴湖帆的日记里可见一斑：1933年12月1日载有“邹百耐来，为松江韩氏藏书出卖之事。另有详细目录，内宋元善本余曾在金城银行见过”；1937年3月9日又见“据金城管理人云……其廿六号柜即溧阳狄平子葆贤丈所有，内贮王叔明《青卞隐居图》与钱舜举《山居图》、唐六如仇十洲合作《云槎小景》卷等”。这些描述，足见其时金城银行保管箱库方家云集，珍藏荟萃，颇具规模。

早年银行机构出于对精神文化价值的认同，还通

过收藏、投资、赞助、展览等方式，竭力支持艺术品金融的发展，当然，这与银行主事者的艺术涵养和爱好品味密切相关，其收藏性与公益性往往相伴相生。

被书画大师张大千称为“性好佛而隐于商，以善济众生为己任”的王一亭，功力深厚，造诣独特，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身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王一亭发起成立了上海豫园书画善会，利用他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极有社会影响与突出效果的书画慈善赈灾活动。根据章程，凡会员出售之书画润费，“得款半归作者，半归会中储蓄，公议拨用，施米送药，助赈各省水旱灾。”如1919年河南发生殃及10多个县的特大水灾，1920年大江南北水旱交替导致灾民达千万人，1921年夏持续暴雨使苏浙皖地区几成泽国，1931年8月苏浙豫皖鲁等19省遭遇大灾民情危急等事件，王一亭均出面主持书画慈善赈灾，除了自己挥毫奉献作品义卖，还动员银行家、实业家踊跃出资认购，募得善款支援灾区。抗战烽火燃起，他又同何香凝联手筹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广泛征集画作，发行慈善销售券，他当场解囊认购6000元。在王一亭亲力亲为的推动下，不少银行、钱庄既收藏了名家名作，增添了金融文化底蕴，又致力于行善积德，赢得了市场美誉度，可谓一举两得。

银行家热衷艺术品收藏，未必尽是笔底春风，亦有重量

级的国宝藏品。譬如蜚声世界的黄金编钟，系清乾隆帝80寿诞之际，各省督抚集资铸造的寿礼，计有编钟12个，大吕4个，共耗费黄金11439两，精美华贵，巧夺天工，堪称中国乐器巅峰之作。黄金编钟历经种种劫难，躲过了日军的疯狂搜查，由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陈亦侯以“账外财产”保存下来，并和其他两位银行同仁秘密谋划，悄悄藏匿在四行储蓄会地下室的小仓库里，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转交给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时，用短波向地面传送的《东方红》乐曲，便是用这套黄金编钟演奏的。

无独有偶，先后出任交通银行协理、金城银行、中南银行、新华储蓄银行董事的任凤苞，长期关注明清方志收藏，他认为“方志一门为国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宏，风俗土宜之纤悉，于是备焉”。在他的努力下，四处搜罗明清方志多达2591种，所藏明代天顺刻本《大明一统志》、弘治刻本《八闽通志》、正德刻本《姑苏志》、嘉靖刻本《南畿志》、隆泰刻本《云南通志》、万历刻本《镇江府志》以及清代顺治刻本《万平县志》、康熙钞本《大清一统志》、康熙刻本《顺德府志》《无极县志》《泽州志》《河间府志》等，皆为海内孤本或珍本。1949年，任凤苞将其珍藏悉数捐献给天津图书馆。

颇有意思的是，当时部分银行还向书画家、文化学者伸出援助之手，安排他们在银行谋取职位，使之衣食有所保障，无疑成就了另一种艺术人才资源的“收藏”。1939年，海派画家潘君诺通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学尤无曲，结识了爱国实业家、金城银行副经理严惠宇，他惜才养士，十分赏识年轻画家的才华。严惠宇除了举荐潘君诺、尤无曲拜丹青名家陈半丁为师，又介绍他们进入金城银行任职，借宿银行公寓，发给一份薪水，以维持生活，安心作画，了却后顾之忧。他们创作的书画作品，或被银行机构收藏，或作为赠送客户的礼品。

中国艺术品收藏源远流长，历史上第一次收藏热大约出现在北宋时期，之后晚明、康乾盛世、清末民初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收藏热潮。西风东渐，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早期银行业趁势而为，借鉴海外金融业务模式和产品门类，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推出艺术品金融业务，满足了市场的融资与保藏需求，构筑了艺术与资本结合的萌芽形态。

民国时期银行以自身独特优势，将资本运作及服务手段引入艺术品收藏市场，不但成为推进民间艺术品收藏良性互动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成为维护社会文化资源物质形态的鲜活标志，呈现出近代中国金融文化与商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始轮廓。比如当时金城银行保管箱库内艺术藏品数量惊人，精品至多，仅宋元本及明钞校本就达百余种，文化财富亦为社会共享。吴湖帆在1933年7月4日《丑移日记》记载：“与百耐、博山、王欣甫等同至金城银行保管库阅书”，“最佳者为北宋《荀子》及《战国策》、《东坡集》（残本）。又南宋刻《晋书》《礼记》《三国志》《昌黎集》《壶山集》，多残本，而皆极精。元刻《梦溪笔谈》，至佳。”与此同时，战乱年代里艺术品得以存放在环境相对安全隐秘的银行保管箱库，使得大量艺术珍品免遭战争劫难，对于保护重要文物功莫大焉！比如近代藏书家杨敬夫的海源阁被军阀攻占聊城时占用，设为司令部，官兵竟用阁内藏书“烧火做饭，擦拭烟枪”，导致大量珍贵古籍损毁，幸亏杨敬夫及时将其中的宋元精本寄存至盐业银行保管箱库，确保这批稀世典籍安然无恙，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尽管如此，限于当时的金融环境与文化背景，早期银行从事的艺术品金融业务也存在诸多问题：银行开展艺术品金融的主观能动性，取决于高层领导者的个人偏好，对行业的影响辐射半径较为有限，未能成为机构整体的文化自觉；艺术品金融的参与群体相对狭小，服务功能及品类比较单一，保管箱库建设并非专门为艺术品量身定制，市场前景晦明不定；银行缺乏专业人才，对于艺术品真伪鉴定存在短板，艺术品质押控制手段捉襟见肘，抵御风险能力薄弱，违章操作现象时有发生，有些银行“一朝被蛇咬”，只好挂起“免战牌”。如1934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关于放款催款应注意之法律行章规定事项致全体行员函》第17条规定：“古玩字画珠宝玉器为押品者绝对禁做。”可见面临市场诸种“暗礁险滩”，已有银行对该项业务持审慎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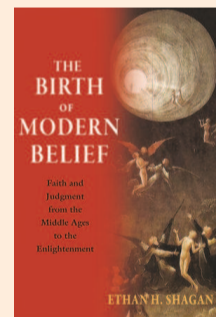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

一周英文新书



Robyn Creswell《起源之城：贝鲁特的诗性现代主义》（普林斯顿出版社）

《起源之城》探索了阿拉伯诗歌中的现代主义运动，该运动于20世纪50年代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现，成为20世纪阿拉伯文学最具影响力和争议的事件。Robyn Creswell在书中为读者介绍了冷战初期黎巴嫩的思想史，当时的贝鲁特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同时也是中东最重要的艺术遗址。该书将阿拉伯诗歌置于世界文学的图景之中——以阿多尼斯为代表的贝鲁特诗人，通过把“现代主义”转化为阿拉伯文字，重新定义了文学传统中的诗歌思想。该书还揭示了现代主义者如何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治、政治自由的概念转化为一种激进的诗学，正是这种诗学，塑造了今天的阿拉伯文学和知识分子间的辩论。



Ethan H. Shagan《现代信仰的诞生：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信仰与审判》（普林斯顿出版社）

通过追溯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基督教西方信仰的历史，该书首次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现代信仰是如何形成的。Shagan展示了宗教信仰如何将自我与判断、观点和感官证据区分开来，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享有特殊声望。但随着新教改革的爆发，“宗教信仰究竟是什么样的知识？”“它与其他认识方式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亟待向公众解答。当交战的教会为这个答案而战时，每个人都声称信仰是他们的专有财产。通过描述持不同政见者如何将宗教信仰视为需要通过个人判断、证据和论证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东西，Shagan挑战了“现代信仰是宗教改革带来的礼物”这样一种普遍观念。